「網路 ・ 人類學」專號（二）：個案研究
考古人類學刊・第 86 期・頁 5-42・2017
DOI:10.6152/jaa.2017.6.0002

移工的網絡社會性：
佤族青年的手機連結、敘事與網絡*

劉 子 愷**

摘 要

來自中國與緬甸邊境農村地區的佤族青年遷徙到廣東工業區從事工廠作業員工作，他們透過智慧型手機上網使用社群媒體（QQ），以敘事、訊息發文和轉貼的方式進行跨人際間的手機溝通和互動，以建立和維繫佤族勞動群體的網絡社會性。這群佤族青年出生於 1990 年之後，經歷了中國自 2000 年以來手機和社群媒體溝通技術快速發展的年代，手機和 QQ 溝通平台不僅成為佤族移工建構身份認同和維繫勞動網絡的重要場域，QQ 也成為他們以個人和集體方式談論和分享勞動經歷的敘事空間。個人 QQ 空間的敘事文字、轉貼漢族移工敘事勞動辛勞的貼文，以及佤音漢字的言語行動皆成為凝聚佤族移工的網絡社會性的重要方式。因受到工作時間限制、返鄉等因素的影響，這樣的網絡關係是時而中斷、時而延續的社會網絡，這樣的網絡關係有時是以佤族族群為認同基礎，有時是以勞動階級共享的勞動經驗為認同基礎，有時則是以使用在地語言的溝通方式為認同基礎。另外，本文也說明佤族移工分享並認同於漢族移工們有關勞動辛勞的集體敘事，以他群的敘事聲音建構我群的集體認同，而手機媒體的語言溝通方式也成為佤族移工區隔他們與漢族移工在身份認同上和手機書寫方式上的差異。

關鍵詞：網絡社會性，手機連結性，社群媒體，網絡，佤族移工

---

* 本文的部分內容曾發表於 2014 年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年會、2016 年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年會、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演講系列、2017 年加拿大人類學會 CASCA/IUAES 聯合會議，特別感謝林瑋嬪主任、傅可恩(Kerim Friedman)、Monica Heller、蕭季樺、蔡美惠等多位老師們給予本文的建議和評論。也感謝考古人類學刊的責編、編輯室人員和論文審查人給予本文詳細而有建設性的修改和編輯建議。本文得以完成想特別感謝長期參與本計畫的佤族青年們，他們願意接受我的訪談和參與觀察，也讓我有機會加入他們的社群聊天群組，並願意分享他們在打工過程中所經歷的工作辛勞和生活點滴，也因為他們的積極協助，我得以瞭解他們在手機生活和日常生活所建立的跨族群人際網絡。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 86 : 5-42 • 2017

Networked Sociality of Migrant Workers: Mobile Connectivity, Narrative and Network among Wa Migrant Youth

Tzu-kai Liu*

ABSTRACT

Troubled by poor economic conditions in their rural homelands in China's southwest border areas, many Wa youth seek work in urban manufacturing districts of Guangdong Province in southeast China. They now rely on smartphones to connect with the social media site QQ. Through narratives and the sharing of online posts and forwarded messages, these Wa youth actively engage with mobile communications and interpersonal networking when on the move. Born in the 1990s, these Wa migrant youth also experienced the years of the booming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 in China. Their mobile networking and networked sociality are fragmented in that they are often prohibited from answering any phone calls and connecting to QQ during work hours or they have to discontinue using their QQ platforms after leaving the factories or returning to their homelands due to financial problems. Through the active use of mobile media, their networking ties are partly ethnic-constructed, partly class-based, and partly language-centered. They develop QQ chatgroups based on ethnic ties among Wa coworkers and villagers, who are from the same ethnic homelands or work in the cities. Moreover, they often share digital narratives of work fatigue, which are originally written by Han workers, on their QQ chatgroups. Finally, living in multilingual and multiethnic work environments in the cities, language use is another key aspect for understanding Wa migrants' identity construction. Frequently, Wa migrant youth create unique phonetic changes in mobile texting and messaging to express their language-centered regional identities by typing the sounds of a regional Chinese variety and Wa using standard Chinese words. In this way, Wa migrant workers create a unique way to distinguish themselves from Han migrant workers.

Keywords: networked sociality, mobile connectivity, social media, network, and Wa migrant workers

*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導言

本文是一個探討中國少數民族的佤族青年移工使用智慧手機建立連結性和網絡關係的數位人類學民族誌研究，欲說明來自位處中國和緬甸邊境上的滄源佤族自治縣的佤族青年移工透過手機溝通平台建立跨人際網絡的身份認同的意義。本文也說明佤族移工個人遷徙歷史和勞動背景，以及他們如何運用手機溝通平台的互動和連結行動建立勞動網絡和跨人際的社會性。手機上網所連結的社群媒體溝通平台提供佤族移工一個跨人際溝通的互動空間，該平台不僅展現訊息交流和人際網絡的連結性，也進一步成為佤族移工的個人敘事和集體敘事的空間，他們可在手機媒體中發表或分享有關勞動經歷的敘事內容，以進行跨人際、跨地域、跨時間的溝通與互動。本文的理論分析架構乃是結合手機作為「溝通」的工具，以及手機作為建立「網絡」的平台的兩種觀點，強調手機媒體和溝通平台包含個人數位敘事、跨人際的互動、訊息分享、共享的勞動經驗的集體敘事，一方面以訊息（個人手機平台的發文、回應他人的手機發文、社群媒體聊天群的訊息、轉貼他人手機發文、轉貼工廠招工訊息等）的流傳和分享而形成的連結性，另一方面以勞動群體為主的凝聚力量而形成的網絡社會性。本文說明佤族移工透過手機和社群媒體平台而建立的網絡關係，有時是以族群認同為基礎，有時是以分享中國勞動者所經歷相類似的勞工處境來凝聚人際網絡，有時又是以在地的語言（佤語和滄源地區使用的漢語方言）為認同基礎來凝聚佤族移工的人際網絡。本文也進一步指出佤族移工生活於多民族聚集和多語言使用的工廠勞動環境時，以及透過手機建立網絡的脈絡時，他們的族群身份、勞動者身份和語言的認同身份是層層相疊的複雜關係，並非由單一族群為認同基礎而建立的人際網絡。

手機媒體、網絡與溝通的研究

自 2000 年以來，智慧手機溝通技術和無線網路(Castells et al. 2007; Horst and Miller 2006）的不斷創新，以及社群媒體（林軍、張宇宙 2010；boyd 2015; Fuchs 2013; Miller 2011; Miller and Slater 2000; Wilson and Peterson 2002）的消費普及化，帶動了以手機為主的跨人際、跨越地域限制建立網絡連結的風潮與趨勢。手機不僅具有通話的功能，它也可以成為個人擁有的「手機媒體」[1]，手機媒體不同於過去的主流媒體(電視、報紙、廣播）的傳播方式（Lewis et al. 2016），它已成為個人化的數位媒體（Ling 2009），結合了網上娛樂、影音、訊息瀏覽、社群媒體網絡連結等多種功能而形成的多媒體溝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平台（Hjorth 2010; Hjorth et al. 2012; Madianou 2014）。手機媒體和溝通科技如何成為個人化和「馴化」（domestication）的媒體是關鍵而重要的議題（Hjorth 2009），也成為人類學研究探討網路數位空間和人際關係的社會性的重要面向（Coleman 2010）。Coleman（2010: 8-9）以「日常生活中平凡且眾聲喧嘩般的數位媒體」（the prosaic of digital media）來形容人參與使用數位媒體（如：手機媒體）的特點，也因為這樣的日常性與多音聲的特點，凸顯了數位媒體在個人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並成為個人可以發表不同於主流論述的發聲平台之一。個人化的手機媒體更進一步成為日常生活的延伸空間（Miller and Horst 2012），這樣的延伸性不單是由書寫或語音聊天等溝通型態所建立的溝通頻道，手機媒體是由多種溝通模式或頻道共同運用的「數位溝通」（digital communication），它可以是書寫、語音、影像、部落格等不同方式於同一時間或不同時間所進行的數位溝通。然而，Goggin 和 Hjorth（2009: 7）曾提出從事以手機媒體為主的多模組化（multimodal）數位溝通研究時，需要面對諸多挑戰，譬如：如何理解手機溝通的內容有多少是個人聲音，又有多少是分享或複製他人的聲音？如何理解手機溝通對於人際關係與網絡帶來正負面的影響與潛在的行動意義？

既有的研究已嘗試由數位媒體的溝通功能和建立網絡的研究取向，提供一些實証研究進行資料分析與理論對話。在此研究取向中，我認為結合「溝通」和「網絡」的觀點來思考手機媒體與身份認同的意義是數位人類學研究一個重要研究方法和理論架構。首先是手機媒體與溝通的研究取向。傳播學家和社會學家對於手機媒體的分析角度雖然也會使用「手機溝通」一詞，但是他們所關心的溝通往往是針對數位溝通的創新技術對社會或是社會運動的組織動員方式所帶來的影響（Castells et al. 2007; Castells 2015）。Castells（1996, 2009）早期的研究所提出的「網絡社會」（networked society）正是建立在這樣的研究架構上，認為個人是附屬於網絡社會中的一員，他的研究出發點所關心的往往不是於日常生活中個人參與使用個人化的數位媒體對於個人或是個人所認同的群體的意涵。近年來，人類學家針對數位媒體的民族誌嘗試修正 Castells 的「網絡社會」的研究架構，提出以日常生活中的數位人類學為研究取徑（Boellstorff 2008; boyd 2015; Horst 2012），說明數位媒體在個人的日常生活和網路生活之間的關連性。以手機溝通的主的人類學研究之中，Horst 和 Miller（2006）針對牙買加的窮人使用手機溝通的研究課題是最具代表性的手機民族誌研究，他們以個人化的手機媒體為出發點，提出以擁有手機（possession）、手機連線（link-up）、手機溝通造成的人際壓力等角度探討手機溝通的社會和文化意義，並說明手機媒體如何提供牙買加窮人「賦權」（empowering）的能力，讓窮人的社會邊緣性能透過手機溝通而有得到改善的機會。也有些學者更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論文

一步將手機媒體所提供的新興溝通方式（如：網路文字、網路愛情、使用特定品牌的手機的消費行為），稱之為手機文化（Goggin 2006），有些研究延續手機媒體的賦權角度，關注於手機媒體的「媒體潛在能力」（media competency）會如何建構或形塑青年的次文化（Donald 2010; Edmonds 2014; Hjorth 2009; Ling 2009; Matsuda 2010）。

其次是手機媒體與網絡的關係的研究取向。近年來，不少學者關注於在特定社會文化、政治經濟、身份認同的脈絡之中，人透過手機媒體所建立的網絡關係的意涵，以及個人因階級、性別、經濟能力上的差異，在建立手機媒體的網絡關係可能面臨的挑戰與限制性 （Hjorth 2010, 2012; Hjorth et al. 2012）。在此之前，人類學家針對網路空間的民族誌研究，關注到新興的社會網絡網址（social networking sites; SNSs）提供的網絡連結的功能改變了以電腦為主的溝通模式（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認為社群媒體的使用與溝通所展現的已不是公領域與私領域的區隔化，而是公領域與私領域的消失與重組，取而代之的是以社群媒體的朋友圈所形成的半公開化的集合體（見 Miller 2012: 149）為建立網絡的基礎。然而，社群媒體的參與使用與多模組的溝通方式往往也受限於手機使用者對於特定社群媒體的「給予性」（affordance）（boyd and Ellison 2007; Miller 2012），使用者建立網絡的機會是否受到時間、空間或是有沒有網路連線功能的影響。

以網絡為出發的手機媒體研究，一方面關注手機溝通技術的個人化，另一方面關注於訊息的生產、流傳、分享或轉貼成為跨人際連結的重要資源（Schiller 2010）。而人類學家針對網路社群媒體的研究（boyd and Ellison 2007; Ellison and boyd 2013; Horst 2012）所關注的也不僅是手機媒體的個人化層面，而是視社群媒體成為建立個人和集體網絡的重要平台（Miller 2012）。有些學者更進一步提出「網絡社會性」（networked sociality）的概念（D. Miller 2012; V. Miller 2008; Papacharissi 2011; Wittel 2001）。社會學家 Andreas Wittel（2001）是最早提出此概念的人，他認為網絡社會性有兩種形式，一是經由個人在網路平台的訊息流傳所建立的網絡關係，另一是以個人在網路空間的「敘事」（narrative）為基礎所建立的社會網絡關係。Wittel 的理論架構著重的是前者，而不是後者。然而，我認為手機溝通資訊的連結性和以敘事為主的社會性不應該被區隔開來討論，兩者間有一定的關連性。有些研究則特別強調社群媒體的連結功能將不同族群、階級、世代的人群連結在一起，而形成的社會網絡關係。譬如：van Dijck（2013）提出以連結性文化的概念來思考數位媒體的連結性與網絡社會性之間的關係，指出數位媒體的網絡關係一種「平台式的社會性」，他強調人在數位空間不是單面向思維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也不是獨立行動者，因此，要解讀透過數位媒體所建立的人際互動和集體行動意義，[2] 就需要結合數位媒體的網絡社會性和連結性的特點加以研究。

再者，近年來，有些學者開始關注於以移工在遷徙的移動時如何透過手機媒體進行遠距的人際溝通。我以佤族移工為關注群體的手機民族誌研究與既有以移工和手機媒體為課題的研究是直接相關的。Madianou 和 Miller（2012）針對遷徙到英國倫敦打工的菲律賓已婚女性移工的研究，提出以多媒體（polymedia）的角度探討母親因工作時間和地理空間的限制發展出多種模式（留言、語音聊天、視頻聊天等）與家鄉的小孩進行手機溝通。然而，這樣的手機媒體溝通可能為人際網絡帶來負面的緊張關係，像是母親在手機媒體張貼她在國外消費的訊息時，可能會改變子女對於母親在外工作是辛勞、為家庭犧牲的印象。Horst 和 Miller（2006）針對牙買加的勞動移工跨國遷徙的研究，提出手機媒體和溝通平台提供社會階級地位較低的移工，以及他們面對工作待遇不平等情況時，建構移工的能動性的重要溝通平台，但是手機網絡往往也造成他們被要求需對家鄉的親屬提供經濟支持的義務與壓力。

目前有關中國打工者的手機媒體的研究，多關注於女性移工的性別認同（Wallis 2013, 2015）、漢族打工者的勞動階級意識（Cheng 2013; Law and Peng 2008; Qiu 2008, 2009）或青年移工與社群媒體（Tao and Donald 2015）的議題。Wallis（2013, 2015）針對於中國北京工作的女性家務移工的研究，認為中國境內相對廉價的手機溝通和無線上網費用，讓來自農村的中國女性移工可以透過手機媒體而維繫她們與長輩和子女的親情與遠距網絡。然而，手機媒體所提供人的能動性也展現「不可移動的移動性」（immobile mobility），意即女性勞動者受限於勞動階級的污名化、較低的學歷或使用不標準漢語溝通等因素，往往無法因手機媒體的跨人群溝通的功能而讓勞動移工在既定的社會階級中發展出垂直式的向上社會流動，僅能在勞動階級內進行水平式的社會移動。另外，現有研究往往將中國打工群體視為單一族群的移工，而沒有關注到中國移工其實是來自不同省份、族群文化、語言背景的勞動群體，也忽略了中國少數民族打工者與漢族打工者在使用手機媒體和社群媒體建立社會網絡和身份認同上的異同之處。

研究方法

本文的田野資料是於 2010 年到 2015 年間參與觀察來自滄源佤族自治縣的班洪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班老鄉的 35 位佤族青年（18 位男性、17 位女性）在日常生活和手機上網溝通的脈絡中使用手機建立網絡的方式與意義，他們工作的工廠位於廣東省東莞市鳳凰崗和深圳市龍崗區附近的工業區，他們離鄉從事工廠勞動工作的時間，最長有八年之久，最短則有一年半。本研究採用數位人類學民族誌的研究方法（見 Boellstorff et al. 2012），[3]觀察他們個人在社群媒體 QQ 中建立具有個人風格的敘事方式和頁面設計，也收集他們在屬於個人帳號的社群媒體平台中談論有關離鄉、參與工廠勞動經驗的敘事，並觀察他們在打工群體的手機聊天群內的人際互動，並收集他們在聊天群內談論有關打工累、佤族勞動身份、佤族族群身份的聊天記錄。

本文認為佤族移工在手機和社群媒體上抒發個人對於打工遷徙過程，以及和工廠勞動生活的感受可以看成是透過手機媒體進行數位敘事的一種溝通方式。手機媒體的敘事方式可以是手機書寫[4]、手機線上語音簡訊或是手機語音聊天等。[5]敘事可以是「個人敘事」（Wortham 2001）的行動，如：敘說個人生活的感受、發表個人對勞動經驗的想法、分享網路訊息、分享生活影像或照片；手機溝通中的敘事也可以是集體「談話敘事」（Ochs and Capps 2001），如：佤族移工透過手機的聊天群組共同敘事他們的勞動經歷和想法。然而，人對於某些事件的經歷具有「可敘說性」，有些經歷則是難以言說的（Ochs and Capps 2001: 33-34）。有些針對網路和社群媒體的民族誌研究（Lambert 2012; Underberg and Zorn 2014）延伸日常生活中的個人敘事說明網路溝通平台上的數位敘事（digital narrative），具有跨越過去、現在的時間性，透過現在的敘事行動敘說個人對於過去特定事件或經歷的說法（Edmonds 2014），敘事行動也能指涉個人對未來生活的期望或看法。

佤族青年的離鄉打工與手機使用

滄源地區佤族青年們能有機會開始參與跨省份的遷徙打工的行為是當地政府和勞工仲介的介入影響，也是過去 15 年以來手機和網路的興起所促成的。第一批佤青年的集體打工潮興起於 2004 年 5 月份，當時是滄源縣政府在同年 3 月舉辦慶祝了滄源佤族自治縣成立四十週年（1964-2004）的一系列節慶活動，這些活動的主要訴求之一是希望能吸引外地遊客前來滄源地區旅遊消費以帶動當地的經濟發展，而滄源邊城空間和民族文化的觀光化和商品化成為當地政府進行旅遊開發的重要手段。另外，滄源縣政府於同年 5 月積極推動佤族農村剩餘勞動力（特別是佤族年青人）輸出成為外省份工廠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勞力作為脫離貧困的重要手段之一，此作法是仿效中國內地其它省份的農村發展模式（Guo and Iredale 2015），該模式的論述是 1990 年代當中國進入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時，農民、民工和文盲被歸類為是素質最低的公民，政府希望這群公民能透過參與勞動市場的方式尋求自我發展（Siu 2015; Yan 2008），參與都市勞動市場是提高農民和文盲的素質的重要手段（Anagnost 2006; Yan 2003; Kipnis 2007）。於 5 月 1 日勞動節假期時，滄源佤族自治縣政府的勞動局與廣東省深圳市的人才市場的仲介合作推動佤族農村青年勞力輸出到城市工業區的項目，當時有來自滄源縣農村地區 100 多名未婚的佤青年（18 歲至 20 歲間）加入第一次的勞務輸出徵人計畫，而他們自己也是第一回能有機會到廣東打工，他們於當地的滄源縣醫院通過基本的體檢後，搭上長途客車，花三天兩夜乘車和轉車的時間才能抵達他們被指派的工作地點，該地點是位在廣東省深圳市龍崗區一家生產內銷洗髮精塑膠瓶的工廠，以及在東莞市郊工業區一家生產外銷歐美玩具的工廠。於 2004-2007 年間，滄源縣政府總計實施了三次的勞務輸出，累計約有 400 百多名佤族青年遷徙到廣東省的深圳和東莞的工業區從事勞力密集的工廠工作。自 2008 年之後，每年在滄源縣境內位在山區的六個鄉鎮 95%的佤族年青人口（18-25 歲）皆遷徙到都市的工業區打工，這也導致滄源縣政府擔心農村勞動力的嚴重不足問題而停止由官方舉辦勞務輸出的計畫。2008 年開始，跨省份的離鄉打工沒有漢族中介和滄源縣勞動局的直接介入，佤族青年的打工遷徙行為是以個人或小團體的方式進行，他們多仰賴於手機和網路的平台獲取都市工廠的招工訊息，由仍在家鄉的青年透過手機和網路的平台與在廣東打工的佤族青年建立手機聯繫。

佤族打工青年的家鄉──滄源縣是位在中國和緬甸邊境，一個由佤、漢、傣等多民族聚居的邊境地區。滄源縣境內 99%的地區皆是海拔 500-2400 公尺的山區，滄源縣城是最主要的商業和行政中心，該縣城位在海拔高度約 500 公尺左右的狹長型壩子，除了移居在此工作的政府單位的官員、職工和他們的家屬、邊防武警和他們的家屬、以及在此經商開設超市、手機店、服飾店、小吃店的漢人移民以外，滄源縣城的範圍內有八個傣族的傳統聚落，而佤族的傳統聚落則集中在滄源縣內的海拔較高的山區。目前全縣登記戶口總人口數約 18 萬人，這之中，當地居民的民族認同登記為官方認定的佤族的人數，占當地總人口數的 85.1%（滄源縣政府網 2015）。滄源縣內的佤族人數是絕對多數，來自外地的漢族商人和政治官員反而是關鍵的少數人，他們往往掌控了發展滄源的官方論述，以及以旅遊開發為主的商業活動。在地佤族居民在政經地位上的相對弱勢，也發生在佤族打工青年身上。特別是，當滄源佤族地區的旅遊開發成為地方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之時，滄源山區農村的佤青年卻無法直接參與旅遊開發並獲得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地工作的機會。過去 15 年以來，滄源縣城一系列以建設邊境文明城鎮為號召的空間改造計畫和以佤族特色旅遊為主的文化再傳統化和商品化過程，多與在地佤族農村青年的直接經濟利益是脫節的。在滄源旅遊市場裡的主要投資和賺錢機會皆被擁有商業投資和開發能力的少數人所掌控，這些人是來自中國內地省份的漢族投資者，或是出生成長於滄源縣城的佤族政治菁英。對於出生成長於山區農村的佤族青年來說，他們能找到的工作機會往往是在滄源縣城的賓館或餐廳裡擔任基層服務員。

過去 15 年間，滄源縣內的手機銷售據點和上網服務的普及化具體改變了資訊交流和消費的方式，自 2005 年起，原本在中國雲南省昆明市和其他大都會區蓬勃發展的手機販售和 3G、4G 網路服務（Wang 2016; McDonald 2016）逐漸延伸到位在中緬邊境的滄源佤族自治縣城。同一年，中國移動公司在滄源縣城開設第一家直營服務據點；之後，在縣城的主要街道上隨處可見到民營的小型手機銷售店。截至目前為止，滄源縣城就約有六十家左右的民營和直營手機店（見圖一），這些手機店也成為當地佤族居民、佤族學生接觸新手機的主要地點，在那裡他們可以親眼見到並觸摸到各大國產電信公司和國際手機公司每季推出的新款智慧型手機。雖然，最新款的智慧手機不是生活於滄源的佤族青年能負擔得起的數位消費奢侈品，他們卻多熱衷於瞭解滄源縣城手機店櫥窗所展示的各式新手機，或是電子廣告中的新手機的訊息，有些人並能清楚說明不同公司推出的最新款手機在功能上的差異。

手機店在滄源縣佤族農村鄉鎮出現的時間較晚，一直到 2008 年，手機店才開始出現在滄源縣內的山區鄉鎮，這樣的發展與佤族打工青年帶給家鄉帶的經濟影響息息相關。因為佤族農村青年打工獲取每月固定的工資，並能以匯款方式寄錢給家人，加上離鄉青年和留在農村家人彼此間期待能以手機保持聯繫的需求，截至 2015 年 12 月底為止，筆者所進行長期田野研究的班洪鄉、班老鄉內（5,500 左右的農村人口）就開設了 7 家手機店（見圖二），這些手機店皆是由來自四川省農村地區的漢族所開設的，他們專門販賣老人專用的按鍵型低價手機、以及二手手機，也提供手機帳號申辦、話費繳交、手機修理的服務。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一　位於滄源佤族自治縣城主要街道旁的手機店（作者攝於 2014 年）



圖二　位於滄源縣班洪鄉政府旁唯一的主要道路旁的手機店（作者攝於 2012 年）

手機溝通平台和社群媒體提供了來自滄源縣農村的佤族青年在離鄉環境中建立新的社會網絡的重要場域，該手機溝通平台也成為他們表達勞動經驗的敘事空間，也是在手機溝通平台，我得以與我所認識的佤族打工青年們建立手機連結關係，並從中得知他們對於離鄉參與都市工廠勞動的個人敘事和心理感受。

第一回離鄉打工的佤族青年們要適應都市工廠的長工時、低資工作環境是一漫長而艱辛的過程。雖然，許多佤族打工青年們產生遠離家鄉農事工作的心理情結，但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較於在都市的勞動身份的邊緣化，仍有不少在廣東打工的佤族青年選擇回鄉。譬如：第一批外出打工的 100 名佤青年男女皆已離開 2004 年他們開始打工的第一家工廠，他們目前的年紀多在 30 歲以上，而所有的男性佤族青年皆已結束工廠打工的生活，有些人返回佤族農村成家、有些人回鄉開設小雜貨店，或是有些人成為駕駛客車的司機，他們認為在廣東打工是適合年青人的「勞力活」，不適合年紀 30 歲以上的人。他們也認為廣東只是「賺錢」（*ndi mae*；佤語：拿錢）的地方，那不是他們一輩子想生活和建立佤族文化觀念中「親屬關係」（*baox nyiex baox ma*；佤語：大家的房子聚居在一起，一起種田一起勞動）的地方。[6]

也因為我先前（1997-2005；2009-2010 年間）在滄源縣班洪鄉進行佤族的南傳佛教信仰和男性耆老的人類學田野工作（Liu 2015b）就已認識當地大約 300 多戶佤族家庭，這些家庭皆有正在都市工廠裡打工的親人，我當時的田野研究關注於他們家中的長輩所積極參與的在地佛事活動，對他們家庭的經濟情況也有一定的瞭解，2008 年之後，當手機成為打工生活重要的一環，我所認識來自班洪鄉的佤族打工青年有時會主動發手機簡訊給我或是透過手機與我取得聯繫，當他們在廣東時，我發現他們皆堅持使用滄源地區的漢語方言與我進行手機溝通，回到自己的家鄉的場合時，他們則能有意識地轉換為佤語與我或同是佤族人進行溝通。他們在漢族居多的城市打工環境大多數時間需使用漢語進行口語溝通，加上他們從小被迫接受以普通話為主的國小和初中教育，他們多數人認同於漢語相對於佤語的強勢語言意識型態的地位，而他們所感興趣的手機溝通並沒有一套專為佤語使用者而設計的文字輸入法，他們必須以漢語拼音輸入法書寫和表達他們的想法（Liu 2015a）。佤族青年在中國勞動群體中所處的邊緣地位成為我的研究初衷，欲探討手機和社群媒體成為佤族打工青年建構個人和勞動身份認同的新場域。

以訊息為主的連結性：智慧型手機和 QQ

使用智慧型手機是離鄉打工佤族青年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電子商品，手機的溝通平台更提供佤族青年一個以敘事和分享方式所建構的社會網絡和手機連結。他們的手機網絡的連結性展現了四項特點。一是打工生活中的手機消費行為和打工訊息的交換。在我所訪談的 35 位佤族青年之中，他們第一回離開家鄉在廣東地區的工廠打工兩個月之後，皆會利用所存下的部分工資前往打工地點附近商店街的手機店購買智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型手機（見圖三），這些商店街的大型超市和小型理髮店也是他們於休假時間前往購物和理髮的主要地點。他們喜好購買的手機往往是由中國手機大廠（小米、華為、Oppo）或國際手機公司（三星）生產的中價位手機，他們多沒有興趣購買山寨手機或是二手手機等低價位手機。他們申請新手機帳號時多是以實名登錄月付型手機新門號，並會開通手機固定的網路使用流量來上網，有些人則是使用已離廠並回鄉的佤族青年的舊手機號碼。

我所訪問過的佤族打工青年之中，每個人皆曾換過至少三家工廠，起因於他們對原本工作工廠的工資待遇太低而轉換到薪資較好的工廠工作，或是換到與自己親戚或是同村人工作的工廠。佤族打工群體在換廠的過程時，他們透過手機而建立的人際網絡是彼此交換工廠工資待遇的高低、工作環境與機器操作是否有高度危險性的主要管道。當他們轉換到不同城市的工業區打工時，會基於話費費率高低的考量而更換手機號碼，主要是因為申請和使用打工地點的本地手機號碼不僅提供同一市內地區的使用者在手機通話上相對便宜的通話費率，也提供較為優惠的手機上網流量方案。



圖三　位於深圳市龍崗區商業街的手機店和網吧（作者攝於 2011 年）

其次是手機溝通平台的連結性看似可跨越了人與人間的空間隔閡和族群界線，但是，佤族打工者的手機使用卻受到許多牽制。譬如：於工廠上班時間他們被要求禁止使用手機，有些人數規模在百名工人以內的小工廠則允許於工人於工作時間可以將手機置於身旁，也可以閱讀手機社群媒體的訊息，但嚴禁任何回覆訊息的動作。另外，他們多數人於每月開通的手機上網流量總數用盡之後，沒有足額金額繼續使用之時，加上他們還未領取每月的工資之前，他們多會暫停使用自己的手機，並停止手機上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論文範本

的服務功能，直到發放每月工資的時候才有機會為手機儲值話費。因此，佤族青年透過手機上網所建立的打工群體間的手機網絡是時而中斷、時而延續的連結。

再者，使用社群媒體是佤族青年積極參與手機溝通很重要的因素，社群媒體也是他們敘事、抒發心情、分享訊息、建立連結性的重要平台。目前佤青年和其它中國打工者最常使用的上網社群媒體是QQ。[7]QQ是中國騰訊公司於1999年所推出的社群媒體網路應用程式，它的功能類似於中國微博。QQ 設立之初，主要盛行於網路覆蓋率較高的中國都會區，使用者多為 1990 年後出生的都市年輕族群。當時中國的網民只能透過電腦連線上網使用 QQ，一直到了 2007 年騰訊公司才推出手機上網專用的「手機 QQ」和「QQ 空間」等網路社群媒體的應用程式（馬化騰 2015）。在 2000-2010 年間，中國國內所發展出的網路社群溝通平台，除了 QQ 以外，還有朋友網、人人網、新浪微博等新興媒體。然而，不同的社群溝通媒體因溝通特性的差異，所吸引的年輕使用者往往是不同的階級背景的。都會區的大學生群體往往對人人網、朋友網、新浪微博有廣泛的喜好（Yuan et al. 2013），2007 年後，手機安裝 QQ 社群媒體的應用程式的使用方式吸引中國手機使用者的廣泛喜愛與接受，一部份原因是因為該程式附有免費的網路遊戲、網路即時新聞的功能，在這一波的 QQ 使用潮也吸引了包括佤族打工者在內的中國勞動群體（Cheng 2013）利用手機上網廣泛地使用 QQ 社群媒體。然而，在還沒有手機版本的 QQ 社群溝通平台可以使用之前，在外打工的佤族青年常在下班後或是放假時造訪工廠附近的私人經營的網吧（見圖四），網吧提供他們可以一邊上網，一邊透過文字或視訊的方式與 QQ 群的朋友聊天的網路空間，這也是他們沒有手機上網時可以建立連結性、維繫人際網絡的重要場域。

對於剛到廣東打工且沒有 QQ 帳號的佤族打工者來說，他們與其它佤族打工群體取得聯繫最快且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申請擁有 QQ 個人帳號，並透過手機上網使用 QQ 空間的功能。目前，在工廠打工的每一位佤族青年至少有一個 QQ 帳號，但不少人仍會於下班時間到工廠附近的網吧上網，因為網吧的網速比起手機上網快，對於喜歡玩網路線上虛擬遊戲和觀看網路影片的佤族青年而言，網吧的高網速是主要誘因。

佤族打工群體的手機 QQ 朋友群也展現了以手機訊息的能見度和穿越性，它超越了既有的社會關係（如：佤族村落間、親屬關係），由佤族打工者的手機 QQ 空間所連結而成的社會網絡。佤族打工青年的 QQ 空間和 QQ 聊天群裡的好友多是來自佤族地區的打工青年，也有不少 QQ 好友是在打工環境因為曾在同工廠工作或是因為租屋住在同一棟出租樓而認識的漢族打工青年，他們的 QQ 朋友群裡很少是因為上網又不曾見過面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會試讀



圖四　一家位於深圳市龍崗區打工者聚集的網吧（作者攝於 2012 年）

加入的人。

佤族打工青年看待 QQ 帳號就如何個人擁有的身分證號碼，一旦手機遺失，QQ 號碼將是不變的，只要有機會再次登錄個人的 QQ 帳號，即可重新與 QQ 帳號內的朋友群取得聯繫。個人 QQ 帳號中的朋友圈也如同佤族勞動群體的協助網絡，當佤族青年因失去工作而陷入經濟困境之時，他們可發送 QQ 訊息給在不同地點打工的佤族親戚或其它佤族打工青年，尋求他們提供暫時的經濟協助。

接下來，本文延伸以訊息為主的手機連結性的思維，從手機和社群媒體平台成為敘事空間的角度出發，討論佤族移工在個人 QQ 空間中談論勞動經驗的個人敘事，以及他們在 QQ 聊天群中談論打工很累的集體敘事，不論是個人敘事或是集體敘事皆可清楚顯示出佤族移工的手機連結性和社會性是結合在一起的，他們在 QQ 空間的數位敘事與他們個人的遷徙歷史也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若是單由以訊息的流傳和分享所建立的手機連結性將忽視了手機和社群媒體是一個眾聲喧嘩的數位空間，也無法考慮到個人在多音聲、眾人參與的手機溝通平台中的能動性。因此，本文建議從手機訊息的連結性的思維轉為從「網絡社會性」的思維為基礎，才有辦法理解佤族移工生活在多民族聚集、多語使用的工廠打工環境，他們使用手機溝通平台對於他們的身份認同所產生的多重意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QQ 成為個人敘事空間

> 真的真的好累，三個月沒有休息，一天一天過，今天想請假，但請假休息又怕工資比別人少，唉！說來說去還不是為了多掙點錢！──21 歲佤族男性移工

> 頭疼死了，還叫我們加班到晚上 11 點，工廠很久沒趕出貨了，每天也不加班，沒加班費可拿，今天開始要加班到 11 點──20 歲佤族女性移工

因為受限於不同工廠的招聘時間和僱用條件上的差異，不論是在千人或百人以上的員工數的工廠內佤族移工的人數往往在40人以內，有些工廠甚至只聘用1-2名佤族工人。在這樣的勞動限制之下，QQ 往往成為在不同工廠工作的佤族移工們建立勞動網絡最有效的方式，他們在個人 QQ 的勞動敘事更是他們彼此之間抒發打工累的情緒壓力，獲得彼此心理支持的重要網絡。兩位佤族移工的 QQ 貼文的背景是發生於 2014 年 9 月份，他們的工廠開始要求作業員在每天 12 小時的正常工作時數之外，每晚加班 4 小時直到晚上 11 點才下班，當時的加班是為了應付國外的聖誕假期前的大量出口訂單，而需要加班趕貨。他們每晚下班之後於入睡之前，除了洗澡、洗衣的日常作息之外，最重要的作息就是利用他們的智慧手機上網進入 QQ，抒發勞動生活的感想，或瀏覽 QQ 平台上流傳的訊息。他們發表 QQ 貼文之後，不到 1 個小時內，在不同工廠工作的 12 位佤族移工陸續發表了簡短的回應，這時段也是他們在平常上班日使用 QQ 發文和回覆或是進行一對一的手機通話最活躍的時間。

佤族移工 QQ 發文是個人敘事的一種文類，也是他們將個人內心的勞動感受轉為公共平台的發聲，進而形成佤族移工群體間的網絡關係和凝聚力量。然而，除了勞動生活感受的貼文之外，佤族移工在 QQ 空間的自我介紹文，以及他們把個人帳號的 QQ 空間加以個性化和美學化，皆進一步呈現 QQ 社群媒體的平台成為他們個人敘事和自我表述的場域。

2011 年，在我訪談一位來自滄源佤族自治縣班洪鄉的 18 歲佤族男性打工青年 Sai meng 的場合中，Sai meng 敘事了他自己對使用 QQ 空間和自我介紹文的看法。[8] 於當地的初中畢業之後，他就一直留在家中幫忙茶園的農事，家中除了父母親之外，還有仍在當地中小學就學的弟妹二人，與他同年齡的佤族年青人都已到廣東和福建一帶的工業區從事工廠作業員工作，留在村里並不是 Sai meng 的心願，當時他父親的肝炎病情加重，導致家中無男性的勞力可以承擔每日的農作，他必須待在家中幫忙農事。20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他父親的體力恢復之後，Sai meng 透過手機的社群媒體溝通平台與在廣東打工的佤族表哥取得聯繫後，他決定離開家鄉前往位在深圳市龍崗附近的一家電子廠打工，他第一回離鄉打工的目的是為了賺錢，以減輕家裡在父親的醫療費和弟妹的學校生活費等經濟支出的負擔。

如同所有在外打工的佤族青年都渴望使用 QQ，Sai meng 來到廣東後的一個月後，他即利用自己將近四分之三的工資，加上向來自同村佤族朋友借的錢，購買了價值人民幣 1,600 元可上網的中國品牌 Oppo 新手機，並第一回申請了 QQ 個人帳號。在工廠打工的第二個月開始，他就積極地在自己手機的 QQ 空間上傳自己和友人的打工生活照片，也會分享打工的辛勞與對工作的不滿。他在自己的 QQ 空間網頁的首頁最上方，即出現自己所設定的網絡假名的下一行，還加上一段 QQ 短言介紹自己。2011 年，在一次面對面訪談中，我詢問他關於 QQ 網路空間的介紹文的想法。

（L：作者；S：Sai meng）

L：你如何把自己的 QQ 名加上自我介紹文？

S：我覺得有意思

L：為什麼？

S：我自己剛開始也解釋不了為什麼，我就覺得有意思 我就…

L：你的 QQ 自我介紹是：「為自己的理想奮鬥，不讓別人看不起。我相信自己會贏。我的理想一定會實現。一定會，相信自己」。說說自己對這介紹的想法

S：是有人說我們少數民族不會什麼的，所以我就要證明給那些人看，我不是不會

L：那些人是哪裡的人？

S：就是來廣東打工才聽到不想聽的，那些話

L：說那種話的是廠裡的人？還是廠外的人？

S：多是工廠裡的那些漢族打工的

Sai meng 的個人敘事表達了佤族打工青年被漢族工人歧視的感受，他當時工作的工廠內有 600 多名基層作業員，除了極少數是苗族和彝族等少數民族背景之外，多數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基層作業員皆來自中國內地省份農村地區的漢族。當時他工作的工廠只有 32 名佤族作業員，工廠生產線的組長、廠長和經理皆是漢族的民族背景。Sai meng 在自己的 QQ 自我介紹文中以堅定語氣說明他不想被漢族工人指責為「我們少數民族（佤族）不會什麼」。他進一步解釋這句話的意涵，對於從來都沒有工廠打工經驗的第一回離鄉的佤族青年來說，他們往往被廠裡的工人指責為欠缺操作機器的知識和自主能力，認為他們根本看不懂機器操作文件內以中英文書寫的說明和專有名稱。

QQ 自我介紹文是手機溝通平台上個人敘事的一種文類，它出現在佤族移工的個人 QQ 空間的主頁左上方（見圖五）位在個人別稱和主頁照片旁。QQ 主頁的下方即是個人發文的留言版。佤族打工青年常會把打工生活遇到的困難與挫折，或是對未來的期望放在個人的 QQ 空間中，以自我介紹短言的方式呈現，如：圖五左邊佤族男性移工的 QQ 自我介紹文「為成功我努力，可總是在創業的路口迷路」、「殘城碎夢」；有些人的 QQ 介紹文則是抒發個人在都市打工的辛勞和孤寂，如：圖五右邊佤族女性移工的 QQ 自我介紹文「年年打工好累啊」、「時間的流逝」。然而，有些 QQ 介紹文與勞動自我的想法並無直接關聯，而是佤族打工者對愛情的渴望與態度，譬如：「愛是緣分，是感動，是一輩子的」、「風決定了蒲公英的方向，你決定了我的憂傷」等。有些人更將 QQ 自我介紹文的欄位當作是臨時留言欄或是過節祝賀之用，譬如：「兄弟姊妹們、同事們，最近暫時無法聯繫，我手機出問題，有事 QQ 留言」、「祝賀大家新年快樂，一世安康，財源廣進」。這些 QQ 自我介紹文反映了個人對勞動身份的自我觀，個人敘事內容更成為可流通的數位訊息，在跨人際間形成可被觀看、可被閱讀的表述文字，這樣的敘事文字與個人的打工遷徙背景是息息相關的。



圖五　兩位佤族移工 QQ 空間的個人主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

佤族青年使用 QQ 介紹文時，他們多數人皆會在不同時間依照自己的心境而改變 QQ 自我介紹文的內容，這樣的改變也提供我做為研究者一個重要窗口，得以進一步瞭解他們為何改變 QQ 介紹文的緣由，以及他們在打工生活的不同時期的身份認同上的變化。

2014 年的 7 月，來自滄源縣班洪鄉 20 歲的女孩 Am meid 與同村的兩位佤族男性一起到廣東省東莞的清溪鎮想找工廠的工作機會，在這之前，她曾在 2012 年於廣東省東莞市清溪鎮的一家電子廠工作一年左右，後來離廠返家。Am meid 是家庭中年紀最小的女孩，家裡的兩位哥哥成家後，與父母和爺爺同住在一起。Am meid 認為自己在家中是邊緣的成員，離鄉打工的目的是想離開爺爺、爸媽及成家的哥哥和大嫂共組的家，自己獨立生活。雖然，她從先前打工回鄉的村民已得知工廠作業員工作是非常艱辛的，但打工是她可以獨立生活的重要途徑。在 Am meid 來到清溪鎮的一週後，我在拜訪另一名曾經訪問過的佤族男性青年的租房處，遇到了她，她當時借住在那位來自同鄉的佤族親戚住處，經過一週之後，她仍無法找到工作機會。在與幾位來自同鄉的佤族青年的一場晚餐聚會場合裡，她以敘事方式分享了她找工作的辛勞，她說明她想進的許多工廠並沒有貼出招工公告，而有招工的工廠她自己對那些工廠的生產工作又不感興趣。在哪個場合中，我也發現到她在自己的 QQ 空間的自我介紹文寫了「發現現實與想像是相反的」。當時，我並詢問她對這句話做為自我介紹文的想法。她以毫不猶豫的語氣回答，說：「我已經想這句話好一陣子了，最近我找工作遇到的種種困難，決定把這段話放上自己的 QQ」。在酷熱的七月她奔波在清溪附近的工業區的工廠門口的招工看板尋找合適的工作機會，經過 10 天之後她仍無法找到工作，她身上的錢也所剩無幾，幾天後，我與她用手機 QQ 交談時發現她更改了 QQ 自我介紹文為「窮人! 想吃零食都買不起!! 悲哀啊」。

QQ 空間提供佤族移工的個人文字敘事的空間之外，也可在個人的 QQ 空間動態欄中上傳日常生活的影像，並可依照個人喜好而調整 QQ 頁面空間的設計和顏色安排。根據 Hjorth（2010: 75-76）研究日本年輕女性的手機使用情形，發現她們會將具有日本可愛風格的手機保護套的圖案和吊飾做為建構日本女性自我認同的方式之一。再者，Horst（2009, 2012）在討論美國年青人使用社群媒體時會因個人喜好將頁面加以個人化和美學化，譬如：融合顏色變化、音樂形式、圖案、動畫、文字內容等多媒體的設計與安排，調整成具有個人風格的社群媒體空間，Horst 將網路空間的個人化稱之為「自我觀的美學」（aesthetics of selfhood），手機的可愛風格以及網路空間個人化就如同 QQ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網

空間的個人敘事一般，將原本一致規格的數位溝頁面轉變為具有個人化特質的空間。

然而，在我所訪談和參與觀察的 35 位佤族移工之中，他們對於 QQ 空間頁面的個人化和美學化的興趣並不高，主要是因為自從 2007 年起，當手機 QQ 應用程式的興起後，佤族移工們就不需直接用電腦上網使用 QQ，他們目前皆是使用智慧手機登錄進入 QQ 空間，進入後出現的第一個畫面是 QQ 朋友圈的人最新的 QQ 發文或轉貼文的動態，而不會進入每個人的 QQ 主頁。這也造成 2007 年之後，佤族移工們花時間將 QQ 空間背景妝點成獨具個人風格的情況日益減少，目前他們多傾向於將 QQ 空間當作是個人敘事生活點滴、愛情觀、分享照片、分享他人的貼文，以及佤族移工們分享勞動經驗的主要場域。然而，我檢視 35 位佤族打工的 QQ 空間的個人主頁後，仍可發現不同性別在使用 QQ 空間上的一些差異。一是佤族男性移工多將自己的 QQ 大頭照設定為華人男歌星、華人男電影明星，有些人則會在 QQ 空間使用能代表城市現代性的汽車、都市風景的背景照片；再者，佤族女性移工不曾將個人穿著工廠工作服的照片放上自己的 QQ 空間，但是，她們卻喜歡上傳她們於假日時與同伴出遊時的合照，或是她們穿著新買衣服的照片，她們於網路空間欲呈現的是自我觀，並不是現實工廠生活中的女性勞動者形象，而是呈現都會女性的形象。

接下來，本文延續 QQ 空間成為敘事和發聲空間的討論，關注於佤族移工群體如何在 QQ 平台（個人 QQ 發文和 QQ 聊天群）的溝通和互動之中，以集體敘事的方式敘說他們所經歷的勞動經驗，以及他們的勞動經驗的敘事與漢族移工群體的敘事方式的異同。

QQ 溝通平台與佤族移工的「集體敘事」[9]

自佤族移工們離鄉來到中國都市工業區打工開始，他們就對使用 QQ 一直有高度興趣，除了使用手機進入 QQ 空間和 QQ 聊天群進行人際溝通和聊天的功能之外，QQ 也提供手機附屬應用程式以獲取不同類別的資訊，包括：QQ 網上遊戲、網上影音、即時新聞頻道、網上購物等多媒體化的功能。當 QQ 空間成為佤族移工抒發打工生活的個人敘事空間之時，QQ 空間中的個人發文、以佤族移工為主的 QQ 聊天群的 QQ 溝通或是轉貼他人 QQ 發文所產生意義，已不僅只是「訊息」的流傳和分享所產生的連結性，而是逐漸轉為建立以佤族勞動群體為主的社會性意義。進一步來說，手機 QQ 溝通以訊息為基礎的連結性，發展為以人際關係為基礎的社會性，這是 QQ 空間的個人化到集體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過程，由此所產生的佤族勞動網絡關係是結合個人敘事和集體敘事的發聲和行動所凝聚而形成的。

自 1990 年代起，當中國的新聞媒體報導開始使用「農民工」、「打工仔」、「打工妹」等帶有歧視性的詞彙來形容由農村到都市工廠的遷徙潮，並以流動人口來形容打工者，「流動」的意涵源自遷徙的移動性，也包括了農村移工無法取得都市戶口的限制，他們成為一群離鄉不離土的勞動者（Murphy 2009）。然而，這些詞彙是由上而下所發展出來的論述，將人因地區身份和性別的差異而加以區隔，忽視了打工群體和生活環境是一個多族群文化、多語言使用的背景。在佤族打工群體中，很少聽到他們使用農民工或打工仔的詞彙，他們會用「做別人的活」（*yuh jian*）的文化概念來形容「離鄉打工」，他們也認為離鄉到工廠打工與當地佤族農村所盛行的同村人之間互惠型的「換工」（*drei*）行為是不同的。[10]

佤族打工青年透過手機的 QQ 空間或是 QQ 聊天群中的連結和社會網絡，可區分出兩種不同類型。一是結合漢、佤和其它勞動群體所形成的集體式的、想像式的勞動網絡，另一是佤族打工青年以佤音漢字的手機書寫方式建構以佤族為認同基礎的社會網絡。

第一類的網絡社會性可見於佤族打工青年分享和轉貼漢族打工者在 QQ 空間抒發有關勞動辛勞的集體敘事。一名把自己的 QQ 取名為「佤族部落」的 25 歲佤族男性打工者，他來自滄源縣班老鄉以佤族人口為主的山區農村，他於 2012 年 1 月份農曆春節前的換工潮期間，因母親生病的緣故必須離開位在東莞塘廈鎮的一家玩具廠內的工作返回家鄉，同年 10 月份家裡農閒的時間，他又隻身來到東莞市想重新找工廠工作的機會，但是，當時大部分的工廠都以徵聘女性作業員為主，身為佤族男性在應徵工廠作業員工作時常面臨挑戰，例如：廣東省的製造業工廠常要求一名佤族男性必須有兩名佤族女性陪同一起應徵，用三人同時應徵的方式佤族男性才有機會順利地以三人入廠的方式找到工作，該地區的工廠經營者因過去的僱用雲南少數民族工人的經驗，對於來自少數民族地區的佤族男性工人存在許多負面的評價，認為佤族男性工人是最難以管理的員工，相對於漢族男性工人，佤族男性員工的請假和曠工的比例高，他們也需要更多時間進行如何操作大型機器的訓練。當 25 歲佤族打工男性來到廣東省塘廈鎮的兩週之後，因性別因素他仍無法順利找到工廠的工作，而必須從事每小時 10 元沒有簽訂工作合同和社會保險的臨時工工作。[11]在 2013 年 1 月的農曆春節前，大批打工者回鄉過年之時，他選擇留在廣東省東莞市附近的工業區，以等待春節結束後各家工廠大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招工的高峰期的來臨。擔任臨時工工作的他在自己的 QQ 空間分享了一篇由當時工廠裡的漢族打工者所撰寫的一篇關於打工生活的 QQ 文，名為「寫給打工上班的孩子」。這篇 QQ 文的部分內容為：

> …或許你現在離鄉背井，生活過的馬馬虎虎，拿著 1-2 千元的工資，有電視看，有手機玩，這就夠了，但是未來在哪裡？當你走出學校進入工廠，你會發現自己的生活世界是那麼狹小，你的活動範圍基本是工廠、出租屋、超市。除了上班和睡覺，你最重要的活動就是去工廠附近的超市購買所需的生活用品。其它的社會生活最多也就是與同事打牌、喝酒，你建立不起自己的社會資源。你孤身一人在外地打拼，身邊沒有父母親人，只有一幫同病相憐的同事…那無奈的漂泊注定了總是在重複地劃著大小不一但形狀相似的圈。明天在哪裡？…如果你現在感覺很觸動、很真實，不妨好好地靜下心來的好好的想想自己的未來在哪裡。我們可能無法改變什麼。但，我們能做到讓更多人看到！

這位佤族青年已在廣東打工近 6 年的時間，換過 8 家工廠，也經歷離鄉、進廠、離廠、返鄉、離鄉、進廠的一再重複的打工遷徙過程，而他多年打工的經歷並無法讓他成為工廠生產車間的第一線管理階層，更沒有機會直接與工廠的中高階層的主管接觸或是建立垂直式的工作職務的升遷機會，他只能在勞工階層中建立起水平式的勞動網絡。

雖然該文的原作者是漢族工人，而佤族打工青年也常對來自漢族工人的社會歧視感到不滿或表達反制言論，當該名佤青年轉發這篇 QQ 文後，在很短的兩小時內將近有 200 名在廣東打工佤族青年在他的 QQ 空間留言或是回應按讚。這些佤族青年的留言，如：「打工確實是這樣的」、「說對了，我們注定漂泊」、「我們沒有社會人脈資源可以改變」。對於佤族打工青年來說，分享漢族勞動群體的打工感受的 QQ 文往往能引起佤族青年的認同，這類的 QQ 貼文是僅次於分享個人生活照片以外，在 QQ 手機空間中最常被轉貼的訊息。在我所參與觀察佤族和漢族打工青年在日常生活的私人聚會場合，他們從來不會主動談起他們打工生活的辛勞，或談起他們身為勞動階級在工作職位升遷的「不可流動性」。不過，一旦有人轉貼漢族打工者發表勞動想法的 QQ 文時，在他們的日常私人聚會中或朋友圈中皆會引發不少討論。這種以分享打工者勞動工作的 QQ 文的特點是以漢族的勞動經驗的貼文訊息的流傳而形成的佤族打工群體的連結性和社會網絡，也是打工群體的集體敘事所形成的一種網絡社會性，佤族移工透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庫

分享他群（漢族工人）的勞動經驗的手機敘事文字，呼應我群（佤族移工）所經歷打工身份的邊緣性與不確定性。

另一類的網絡社會性是建立在以佤族勞動群體內為主的手機連結和溝通。2014 年 12 月這名「佤族部落」的佤族打工青年在一個以滄源打工佤族青年所組成的 QQ 聊天群裡，[12] 他分享了另一篇由漢族打工者寫的 QQ 文（見圖五），標題為「進工廠失去了太多，你知道多少？打工的必看！」，該原始貼文也附有工廠生產線的勞動照片。



圖六　一位佤族打工男性分享漢族移工的 QQ 文

QQ 文的部分內容為：

…我沒有錢。錯！不是沒有錢，而是沒有賺錢的腦袋，工作幾年了沒有錢嗎？是有了。但是花掉了，花在沒有回報的事情上面，像是吃喝玩樂…打工生活真不好混，早起晚睡又困又累，鬧鐘一響掀開熱被，伸伸懶腰還想要睡，逼於無奈洗刷速起，急急忙忙整理必備，早餐饅頭令人反胃…休息時間令人回味，想打電話話費太貴，遠看工廠像天堂，近看工廠像銀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到了工廠像牢房

這篇 QQ 文被一名來自滄源佤族自治縣的佤族打工者轉貼在他所設立的 QQ 聊天群的聊天欄位中，只有加入該聊天群內的佤族打工青年才能讀取到該 QQ 轉貼訊息。當 QQ 聊天群內有類似關於漢族談論打工生活的 QQ 轉貼文出現時，聊天群內的佤族移工會熱絡地在該聊天群的聊天欄位中發表自己的想法。有些回應文是使用標準漢語進行書寫的，有些回應則是以佤音漢字來書寫，這是將漢族移工的 QQ 文的分享，轉變為以佤音漢字的書寫方式來回覆，用以敘事佤族打工自己對工廠勞動的看法。

一位稱為「傻瓜站起來繼續」的佤族女性打工者的 QQ 聊天群的回應之中，她寫到：「活尼」（佤語語意：是的）。其它的佤族打工青年有人回應「江山不洛」（佤語語意：團結在一起）、「瑟嚷」（佤語語意：加油）。由於手機 QQ 溝通平台是以漢語拼音輸入法所建構的一套手機寫作系統，在 QQ 溝通平台上，佤族青年會將他們的族語（佤語）的語音轉換為類似的中文字用以表達佤語的語意，然而在沒有翻譯者的情況下，不懂得佤語的漢族打工者或其它打工群體是無法完整地解讀出這些佤音漢字的意涵。

佤漢的使用成為佤族工人創造出獨特的手機書寫技巧。當有漢族人在場的談話場合，若是佤族打工青年的談話內容涉及佤族青年間的個人隱私，或是對漢族管理者的工作抱怨時，佤族青年往往會以佤語進行交談，而不會使用雲南漢語方言進行交談。佤族工作的工廠裡的漢族打工者們除了能聽懂簡單的佤語詞彙（如：som meix nux「你吃飽沒？」）之外，並沒有人能真正懂佤語和佤語詞彙所代表的文化意涵。當佤族青年在 QQ 聊天群中以書寫進行溝通時，他們以佤音標記為中文字的方式，一方面形成了類似於佤族和漢族移工間的人群區隔的效果，另一方面來自同一區域的佤族打工者經由共享的、可相互理解的佤語語意，而凝聚出佤族勞動群體的同儕認同，此認同所體現的是網絡社會性的另一種形式。在多民族、多語言使用的都市工業區的移工生活環境之中，具有雙語能力（佤語、漢語）的佤族移工們在語言使用上的策略，可以是佤音漢字的 QQ 書寫或是使用佤語的交談方式，這些語言策略區隔了佤族打工者與非佤語使用者在勞動群體認同和網絡關係的不同，這些策略也是他們建立佤族勞動群體的身份認同的重要依據。

漢族移工的 QQ 文的出現始於個人的文字敘事，它被上傳於 QQ 平台後，由一位佤族移工轉貼在特定的佤族 QQ 聊天群，而成為佤族聊天群成員間集體的談話敘事，也可以進一步呼應 QQ 文，或敘說著個人對於打工生活的感受。訊息在跨人際間的手機溝通平台的流傳產生的人際間的手機連結性，也因佤族移工的感同身受的勞動經驗而有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會發展出以佤族移工的身份認同為基礎的網絡社會性。由此也可見，因手機資訊的流傳而建立的連結性，延伸出以佤族移工身份認同為主的網絡社會性的過程，這過程中佤族移工與漢族移工間的族群界線可以是消失不見的，也可以是清楚區隔的，針對中國移工處境的個人敘事的聲音（如：漢族移工的 QQ 文）往往融入了社會聲音的集體敘事，這類 QQ 文是個人敘事的聲音，也融入了勞動群體的社會集體聲音。

時而中斷、時而延續的網絡社會性

佤族移工上班的工廠大多會要求上班時間不能使用 QQ，加上佤族移工的離鄉、進廠、離廠、返鄉過程之中，有些人因無固定經濟收入而無法持續使用智慧手機上網使用 QQ，這些因素往往造成佤族移工透過手機媒體所建立的網絡社會性是時而中斷、時而延續的。另外，佤族移工在個人手機 QQ 平台上的書寫敘事是以互動為基礎而維繫的，佤族移工的網絡社會性往往是建立在遠距、非同一時間發生的手機訊息互動。

下面是一群打工者的手機 QQ 進行即時溝通的部分內容，這是一個手機書寫互動的例子，參與溝通的人包括：四位（三名男性，一名女性）佤族打工青年，以及三位（兩名女性，一名男性）漢族打工青年。他們以訴苦的語氣進行 QQ 書寫溝通。這類關於「打工累」的 QQ 書寫與溝通互動是最常出現在他們 QQ 即時通訊的敘事文類之一。

A ：老子累死了。不想幹了。2013 年 9 月 5 日 04:20 評論和回應：

B ：兄弟 俺也一樣 

2013 年 9 月 5 日 04:29

A ：你應該比我好吧！

2013 年 9 月 5 日 04:52

C ：怎麼了。。。別發脾氣，平常心就好

2013 年 9 月 5 日 05:19

B ：累啊 

2013 年 9 月 5 日 05:51

A ：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13 年 9 月 5 日 05:51

D ：都一樣，辭工辭工

2013 年 9 月 5 日 06:04

A ：呵呵。

A ：等你先走。我再走

2013 年 9 月 5 日 06:49

E ：唯唯走人能去哪裡啊？如果是再進廠就沒有必要辭工。到哪裡都是一樣滴！

2013 年 9 月 5 日 07:24

F ：這還不簡單啊，滾蛋啊！

2013 年 9 月 5 日 07:24

A ：滾蛋後。不知道去哪裡。

2013 年 9 月 5 日 09:48

G ：累了就休息啊！

2013 年 9 月 5 日 11:54

佤族打工者（A）在發出這個 QQ 簡訊溝通之時，他正在工廠的生產車間上夜班，自從晚間 8 點進廠開始，他已經連續上工 8 個小時，他於凌晨 4 點左右利用在工廠廠房的樓梯間偷偷地上傳了這則 QQ 簡訊，說明自己打工很累的情況。回覆這則 QQ 簡訊的打工青年除了一名上白班的佤族青年（G）以外，其餘的人是在不同工廠裡上夜班的打工者。有些人的回應提供同理的支持或是送上表情符號以示同情，有些人則表達一起辭工的想法。在 E 的回覆中，說明去哪一個工廠打工會是一樣的勞累，她的敘事表達對辭工的個人看法，而 A 隨後的回應則表達他對辭工後的擔憂。

這類打工累的談話互動和集體敘事方式，形成了打工群體間共享的勞動感受，透過手機 QQ 空間中的留言互動能間接地形成打工群體之間的凝聚力和網絡關係，雖然受限於工作時間往往無法正常使用 QQ，他們也常無法在上班日進行 QQ 簡訊的即時短言溝通，不過，透過 QQ 簡訊留言還是得以連結了在不同工廠上班的工人，並交換彼此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論文

工廠打工的辛勞與無奈的看法，佤族移工認為這類的留言和互動是他們在遠距的打工環境中能提供彼此間的情緒宣洩和心理支持的重要方式，這是以訴苦的、心理相互支持為基礎的網絡社會性，打工累的敘事並不是以 QQ 留言的訊息的流傳而建立的手機連結性，而是以回應 QQ 發文內容的移工們共同建構的網絡社會性。

本文佤族移工使用手機社群媒體平台建立連結性和社會性為討論重點，並說明佤族移工皆渴望擁有手機、擁有個人的 QQ 帳號和建立勞動網絡的意義，然而，每位佤族移工皆積極於參與手機溝通平台的互動和溝通嗎？佤族移工的網絡社會性是否存在反制該社會性的力量？

不論是佤族移工個人在 QQ 空間中的貼文，或是在佤族群體為主的 QQ 聊天群中的發文，並不是 QQ 朋友圈內的所有人皆會積極參與 QQ 空間的網上即時聊天，或是主動回覆 QQ 空間的主人的發文或轉貼文。有些人只會用 QQ 簡單圖案按讚或不支持的態度，也有不少人是保持沈默、不積極參與網上聊天互動的 QQ 朋友。佤族移工可能因為工廠禁止上班時間使用 QQ、離開工廠返回家鄉後無法上網、或是手機每月上網流量已用盡等因素，造成佤族移工成為 QQ 溝通平台上的沈默者。在我所認識的 35 為佤族移工之中，就有 3 名移工刻意與來自佤族家鄉有親戚關係的佤族移工保持距離，刻意不想在移工環境中延續原有的親屬網絡關係，也不讓有親屬關係的佤族青年加入自己的 QQ 朋友群，他們做出如此決定的原因是移工的家庭間的人際衝突和緊張關係，他們想規避來自同村親戚的移工的經濟協助，以及佤族村落的人之間彼此協助的社會價值觀和人情壓力。

當 2014 年 8 月底在我即將離開 Ai kam 位在廣東省深圳市龍崗附近工業區的工作地點的前一天晚上，那天晚上他從廠裡下班後的休息時間，他告知我想以稍微不同的敘事方式在 QQ 空間中抒發當日打工累的感受，他的 QQ 個人敘事內容為：「人生就是如此，該是青春歡樂的年紀，卻背負這沈重的經濟壓力與煩惱，老天啊！你真的是對我太好了，好的我快撐不下去！」。透過先前與我個別訪談有機會瞭解他個人打工遷徙的背景，他也分享他長期以來在個人帳號的 QQ 空間中以訴苦方式抒發打工很累的個人敘事，這回他結合自我調侃和訴苦的口吻來抒發內心感受，也因為這樣的調侃口氣，在回應他的發文的佤族移工朋友們皆以開玩笑的語氣加以回覆。而我一開始讀到他的 QQ 發文時，並不知道 Ai kam 那天在廠裡所經歷的事情。在隨後的面對面聊天中，才得知那天他上班操作大型製壓機時，不小心誤觸到機器的啟動按鈕，而差點造成和他一起工作的一位漢族同事右手臂被機器夾住，他當時的行為受到廠裡生產線主管的嚴厲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責，這也是他離開家鄉到廣東打工以來，受過廠裡主管最嚴厲的責罵。Ai kam 的敘事風格和 QQ 回應方式的變化，就如同日常工廠勞動生活經歷著不同挑戰一般，敘事方式可能因個人每日的經歷而有所改變。單由一次的敘事內容的流傳與分享而串連的「連結性」的角度，是無法完整瞭解敘述文字背後的身份認同和能動性的意義，唯有瞭解佤族移工們的個人離鄉打工的背景，才有機會對手機 QQ 空間的敘事性、訊息的連結性和佤族移工的社會性三者間的關聯性有一全面性的瞭解。

結論

本文提出以結合佤族的個人移工背景、資訊流通建立人的連結性，以及佤族移工群體為基礎的社會性，用以解釋人和手機溝通平台的互動和溝通行動，並探討佤族移工的社會網絡的凝聚方式、他們的社會性和勞動網絡的行動意義。既有針對移工使用社群媒體的研究提出數位科技（Madianou and Miller 2012: 142）透過消費過程吸引消費者的購買，並將數位科技加以個人化，數位科技更進一步地影響跨人際間的互動和社會網絡的建立。本文針對佤族移工使用手機溝通平台凝聚和維繫網絡社會性的討論，基本呼應了這樣的研究脈絡，並說明佤族青年的打工遷徙的移動性，以及手機能跨越地域的連結性之間的關聯性。

然而，佤族青年移工參與使用手機媒體的資料，提供了不同於現有的數位人類學研究和移工研究的新觀點，一是，佤族移工的手機溝通凸顯他們工作的中國都市工業區是一個多族群、多語言使用的打工環境，本研究結合了溝通和網絡的觀點的手機民族誌研究，指出多語言的互動與手機溝通是佤族移工建立身份認同重要的一環。二是，佤族移工建立的網絡關係不僅是以個人化的手機媒體為基礎，他們以佤族群體、勞動群體和在地語言為基礎建立層層相疊的網絡連結和社會性。三是，他們的手機媒體的溝通平台是個人敘事的空間，也是集體敘事的空間，這不能單由「網絡個人主義」加以解釋，而需要結合個人和群體所建立的網絡社會關係加以分析。

在此基礎之下，本文提出佤族移工在多民族聚集、以漢語為主的工作環境中的邊緣性。他們經歷離鄉、進廠、離廠、返鄉、離鄉、進廠的一再重複的過程，然而他們因佤族身分、漢語能力等因素無法在以漢族移工和漢語為主的工作環境中建立垂直式的社會流動，他們的社會流動往往是在勞動階層中建立起水平式的社會網絡。也是在此背景中，手機溝通平台提供「遷徙的勞動者」建立移動的社會網絡的重要場域，手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溝通平台也成為他們建立身份認同的敘事行動。佤族移工在 QQ 空間的自我介紹文成為他們個人敘事和自我表述的重要場域，也與他們在日常的勞動經歷相關。佤族移工在個人 QQ 空間發表有關打工累的貼文，透過貼文訊息的流傳和分享，以及 QQ 平台上的留言和互動，進而提供移工者彼此間的情緒宣洩和心理支持的重要方式，凝聚佤族移工群體間的社會網絡。最後，佤族移工於 QQ 空間和 QQ 聊天群中轉貼漢族移工的 QQ 文的行動，可進一步展現出佤族移工建立網絡社會性的特點，透過轉貼漢族工人的勞動經驗的 QQ 敘事文，以呼應「我群」的打工經歷，他們也在佤族移工為主的 QQ 聊天群中，以佤音漢字的方式凝聚佤族勞動群體的身份認同，讓原本屬於統一制式的手機網路溝通技術和手機書寫模式，由佤族打工群體發展出佤音漢字的手機書寫方式，得以區隔他們在勞動群體中與漢族打工者之間的差異性。手機和 QQ 社會網絡提供在家鄉與都市間遷徙移動的佤族移工們，一個可以敘事、想像、抒發感受、心理支持的空間，也是他們建立和維繫具有多重的網絡與身份認同的數位平台。

附　註

1. 「手機媒體」指的是運用智慧手機、平版連接上無線網路的功能，進而登入使用具有個人帳號的「社群媒體」（social media）。
2. 關於數位媒體的溝通平台所促成的社會運動的人群動員和集結的力量，見王維菁等 2013；黃上銓 2016；Castells 2015；Juris 2012；Langman 2005；Rainie and Wellman 2012。
3. 關於如何參與觀察網路和手機溝通平台的人際互動，詳見該書的第五章；如何對網路使用者進行訪談的基本方法，見第六章的討論；如何觀察和收集網路和手機書寫的文字敘事和影像資料的基本方法，見第七章的討論。
4. 關於「手機書寫」的發展歷史與討論，見 Goggin 2006: 66-72。
5. 本文所分析的手機溝通和其它民族誌資料只包含手機書寫溝通的資料，佤族打工青年的語音簡訊和語音聊天的資料沒有包括在本文的討論內容。
6. 本文使用的佤語書寫是依據《佤漢大辭典》（2014）佤語羅馬拼音法。
7. 他們少數人也會使用騰訊公司於 2011 年發佈的微信（WeChat）服務，它提供影音即時通訊的功能，然而佤族移工因工廠工作時間的限制，絕大多數人仍是喜愛使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QQ 為主，QQ 提供線上聊天以外，更多元的個人部落格空間、影音、線上遊戲等功能，它是一種線上社交溝通的平台。

8. 我與打工佤族青年的訪談是以漢語進行的，而 QQ 網絡溝通平台以中文進行溝通，透過漢語拼音的輸入法而書寫漢語。歷史上，佤語是沒有文字的，中國於 1950 年代的民族識別工作時，語言學家曾為沒有文字的佤語創立一套書寫用的佤文，這是依照滄源岩帥的佤語方言為標準音而創立以英文字母來書寫的佤文（見佤漢大辭典編纂組 2014），這套佤文目前僅使用於政府的出版品之中，做為宣傳佤漢雙語的國家語言政策，但是，佤文很少使用於佤族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我所認識的佤族打工青年（18-28 歲）沒有人懂得使用這套佤文。他們的 QQ 文字溝通皆是以中文進行的。

9. 手機和 QQ 訊息的流傳所產生的連結性，往往成為中國勞動群體串連抗爭行動的重要依據，在 QQ 平台上針對勞動事件的集體發聲也可以是集體敘事的一環。在 2007-2015 年間，以漢族為主要勞動人口的廣東工業區裡曾發生過因工廠惡性倒閉並積欠工人工資而引發的勞工集體抗爭（Peng and Choi 2013; Qiu 2008），當時漢族抗爭者即透過手機 QQ 發送抗爭的即時訊息，得以突破中國政府在網路上對抗爭行動消息的網路監控和封鎖。然而，佤族打工青年對於勞工抗爭往往是被動參與的，以佤族為號召的集體勞工抗爭行動卻未曾發生過，他們往往是工廠裡最低階的作業員，有機會擔任第一線生產小組長往往是來自湖南、四川或河南的漢族工人所擔任，不論是在廠內員工或是在廠外的消費生活圈，這些來自同一省份的漢族打工者已形成很緊密的社會網絡，勞工抗爭往往是建立在這類的漢族打工者的社會網絡而興起的。

10. 在我的田野經驗中，佤打工青年對媒體使用的「農民工」、「打工仔」等詞彙並沒有深刻的認同感，導因於在打工的工廠和工業區的生活消費活動中他們的人數皆是相對少數的，更因為他們在打工環境常被漢族打工者、工廠經營者認定為漢語說寫能力較差，而被歸類為工廠打工群體中的他者。

11. 在廣東地區打工的多數佤族男性，他們在找到工廠內正式作業員的工作之前皆曾經做過一段時期臨時工的工作，佤族女性打工者往往被工廠經營者認為是「順服」的作業員可以忍受單調而長工時的生產線工作，而我所訪談的 17 位佤族女性打工者也證實了她們與佤族男性在求職過程中的差異，她們沒有人從事過臨時工的工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2. 這個 QQ 聊天群是佤族打工青年所設立的十二個手機 QQ 聊天群中的一個。十二個聊天群中的群組成員多數是佤族移工（包括：在工廠打工的人、離廠還未找到工作的人、離廠回鄉的人），其中的三個聊天群組則有一半成員為漢族移工，這些漢族人是佤族移工在不同工廠工作時所認識的朋友，後來被邀請加入佤族移工成立的手機 QQ 聊天群。

引用書目

王維菁、馬綺韓、陳釗偉

2013 〈網際網路時代的社會運動：以台灣環境運動組織為例〉，《資訊社會研究》25：1-22。

林軍、張宇宙

2010 《馬化騰的騰訊帝國》。臺北：商周出版。

馬化騰

2015 《互聯網+》。北京：中信出版集團。

佤漢大辭典編纂組

2014 《佤漢大詞典》。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

黃上銓

2016 〈魯蛇的公民覺醒：從一人到場到五十萬人上街頭〉，刊於《婉君妳好嗎？給覺醒鄉民的 PTT 進化史》。黃厚銘編，頁 267-309。新北市：群學出版社。

滄源縣政府網

2015 《滄源簡介：2010 年人口普查》。http://www.cangyuan.gov.cn/，2016 年 12 月 1 日上線。

Anagnost, Ann

2006 The Corporeal Politics of Quality (Suzhi). Public Culture 16(2): 189-208. Doi: 10.1215/08992363-16-2-189

Boellstorff, Tom

2008 Coming of Age in Second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oellstorff, Tom, Bonnie Nardi, Celia Pearce, and T. L. Taylor

2012 Ethnography and Virtual Worlds: A Handbook of Method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oyd, danah

2015 It's Complicated: The Social Lives of Networked Tee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boyd, danah M., and Nicole B. Ellison

2007 Social Network Sites: Definition, History, and Scholarship.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3(1): 210-230. Doi: 10.1111/j.1083-6101.2007.00393.x

Castells, Manuel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Malden: Wiley-Blackwell.

2009 Communication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 New York: Polity.

Castells, Manuel, Mireia Fernandez-Ardevol, Jack Linchuan Qiu, and Araba Sey

2007 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A Glob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Cheng, Chung-tai

2013 Floating Workers and Mobile QQ: The Struggle in the Search for Roots. *In* Migration, Diaspora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Global Societies. Leopoldina Fortunati, Raul Pertierra, and Jane Vincent, eds. Pp. 218-229. New York: Routledge.

Coleman, E. Gabriella

2010 Ethnographic Approaches to Digital Media.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9: 487-505. Doi: 10.1146/annurev.anthro.012809.104945

Donald, Stephanie H.

2010 Introduction: Why Mobility Matters: Young People and Media Competency in th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sia-Pacific. *In* Youth, Society and Mobile Media in Asia. Stephanie H. Donald, Theresa D. Anderson, and Damien Spry, eds. Pp. 3-12. London: Routledge.

Edmonds, Fran

2014 Digital Storytelling and Aboriginal Young People: An Explo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to Support Contemporary Koori Culture. *In* Mobile Media Making in an Age of Smartphones. Marsha Berry and Max Schleser, eds. Pp.92-103.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Doi: 10.1057/9781137469816_9

Ellison, Nicole B., and danah boyd

2013 Sociality through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et Studies. William H. Dutton, ed. Pp. 151-17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uchs, Christian

2013 Social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Goggin, Gerard

2006 Cell Phone Culture: Mobile Technology in Everyday Life. London: Routledge.

Goggin, Gerard, and Larissa Hjorth

2009 The Question of Mobile Media. *In* Mobile Technologies: From Telecommunications to Media. Gerard Goggin and Larissa Hjorth, eds. Pp. 50-61. London: Routledge.

Guo, Fei and Robyn R. Iredale

2015 Current Trends, Emerging Issue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In* Handbook of Chinese Migration. Robyn R. Iredale and Fei Guo, eds. Pp. 297-318.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Doi: 10.4337/9781783476640.00023

Hjorth, Larissa, Jean Burgess and Ingrid Richardson

2012 Studying the Mobile: Locating the Field. *In* Studying Mobile Media: Cultural Technologies, 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the iPhone. Larissa Hjorth, Jean Burgess and Ingrid Richardson, eds. Pp. 1-10. New York: Routledge. Doi: 10.5210/fm.v0i0.4203

Hjorth, Lariss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09 Domesticating New Media: A Discussion on Locating Mobile Media. *In* Mobile Phone in the Asia-Pacific: Gender and the Art of Being Mobile. Pp. 241-251. London: Routledge.

2010 The Price of Being Mobile: Youth, Gender and Mobile Media. *In* Youth, Society and Mobile Media in Asia. Stephanie Hemelryk Donald, Theresa Dirndorfer Anderson and Damien Spry, eds. Pp.73-87. London: Routledge.

2012 iPersonal: A Case Study of the Politics of the Personal. *In* Studying Mobile Media: Cultural Technologies, 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the iPhone. Larrisa Hjorth, Jean Burgess and Ingrid Richardson, eds. Pp. 190-212. London: Routledge.

Horst, Heather

2009 Aesthetics of Self: Digital Mediations. *In* Anthropology and the Individual: A Material Culture Perspective. Daniel Miller, ed. Pp. 99-113. New York: Berg.

2012 New Media Technologies in Everyday Life. *In* Digital Anthropology. Heather Horst and Daniel Miller, eds. Pp. 61-79. New York: Berg.

Horst, Heather, and Daniel Miller

2006 The Cell Phone: An Anthropology of Communication. New York: Berg.

Juris, Jeffrey S

2012 Reflections on #Occupy Everywhere: Social Media, Public Space and Emerging Logics of Aggregation. American Ethnologist 39(2): 259-279. Doi: 10.1111/j.1548-1425.2012.01362.x

Kipnis, Andrew

2007 Neoliberalism Reified: Suzhi Discourse and Tropes of Neoliber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N.S.)13: 383-400. Doi: 10.1111/j.1467-9655.2007.00432.x

Lambert, Joe

2012 Digital Storytelling: Capturing Lives, Creating Community. London: Routledge.

Langman, Lauren

2005 From Virtual Public Spheres to Global Justice: A Critical Theory of Internetworked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ocial Movements. Sociological Theory 23(1): 42-74. Doi: 10.1111/j.0735-2751. 2005.00242.x

Law, Pui-lam and Yinni Peng

2008 Mobile Networks: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ern China. *In* Handbook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Studies. James E. Katz, ed. Pp. 55-64.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Doi: 10.7551/mitpress/9780262113120.003.0005

Lewis, Tania, Fran Martin and Wanning Sun

2016 Telemodernities: Television and Transforming Lives in Asi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Ling, Rich

2009 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Teen Emancipation. *In* Mobile Technologies: From Telecommunications to Media. Gerard Goggin and Larissa Hjorth, eds. Pp. 50-61. London: Routledge.

Liu, Tzu-kai

2015a Minority Youth, Mobile Phones and Language Use: Wa Migrant Workers' Engagements with Networked Sociality and Mobile Communication in Urban China. Asian Ethnicity 16(3): 334-352. Doi: 10.1080/14631369.2015.1015255

2015b The Practice of Deference and its Politics: Theravada Buddhist Beliefs and Hierarchical Dynamism in China's Southwest Border Areas.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3(2): 67-100.

Madianou, Mirca

2014 Smartphones as Polymedia.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9(3): 667-680. Doi: 10.1111/jcc4.12069

Madianou, Mirca and Daniel Miller

2012 Migration and New Media: Transnational Families and Polymedia. London: Routledge.

Matsuda, Misa

2010 Japanese Mobile Youth in the 2000s. *In* Youth, Society and Mobile Media in Asi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tephanie H. Donald, Theresa D. Anderson and Damien Spry, eds. Pp. 31-42. London: Routledge.

McDonald, Tom

2016 Social Media in Rural China. London: UCL Press.

Miller, Daniel

2011 Tales from Facebook.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In* Digital Anthropology. Heather A. Horst and Daniel Miller, eds. Pp. 146-161. New York: Berg.

Miller, Daniel and Heather A. Horst

2012 The Digital and the Human: A Prospectus for Digital Anthropology. *In* Digital Anthropology. Heather A. Horst and Daniel Miller, eds. Pp. 3-38. London: Berg.

Miller, Daniel and Don Slater

2000 The Internet: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Oxford. Berg.

Miller, Venice

2008 New Media, Networking and Phatic Culture. Convergence 14(4): 387-400. Doi: 10.1177/1354856508094659

Murphy, Rachel

2009 Migrant Remittances in China: The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Benefits and Social Costs. *In* Labor Migr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Rachel Murphy, ed. Pp. 47-72. London: Routledge.

Ochs, Elinor, and Lisa Capps

2001 Living Narrative: Creating Lives in Everyday Storytell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apacharissi, Zizi

2011 Conclusion: A Networked Self. *In* A Networked Self: Identity, Community, and Culture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Zizi Papacharissi, ed. Pp. 304-318. London: Routled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eng, Yinni and Susanne Y.P. Choi

2013 Mobile Phone Use among Migrant Factory Workers in South China: Technologies of Power and Resistance. The China Quarterly 215: 553-571. Doi: 10.1017/S0305741013000738

Qiu, Jack Linchuan

2008 Working-Class ICTs, Migrants, and Empowerment in South China.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8(4): 333-347. Doi: 10.1080/01292980802344232

2009 Working-Class Network Societ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formation Have-Less in Urban China.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Rainie, Lee and Barry Wellman

2012 Networked: The New Social Operating Syste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Schiller, Dan

2010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iu, Kaxton

2015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Everyday Lives of Chinese Migrant Factory Workers. The China Journal 74: 43-65. Doi: 10.1086/681813

Tao, Lina and Stephanie H. Donald

2015 Migrant Youth and New Media in Asia.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New Media in Asia. Larissa Hjorth and Olivia Khoo, eds. Pp. 28-38. London: Routledge.

Underberg, Natalie M. and Elayne Zorn

2014 Digital Ethnography: Anthropology, Narrative, and New Media.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van Dijck, Jose

2013 The Culture of Connectivity: A Critical History of Social Med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allis, Cara

2013 Technomobility in China: Young Migrant Women and Mobile Phones. New York: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5 Micro-entrepreneurship, New Media Technologies and the Reproduction and Reconfiguration of Gender in Rural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1): 42-58. Doi: 10.1080/17544750.2014.988633

Wang, Xinyuan

2016 Social Media in Industrial China. London: UCL Press.

Wilson, Samuel M., and Leighton C. Peterson

2002 The Anthropology of Online Communiti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1(1): 449-467. Doi: 10.1146/annurev.anthro.31.040402.085436

Wittel, Andreas

2001 Toward a Networked Socialit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8(6): 51-76. Doi: 10.1177/026327601018006003

Wortham, Stanton

2001 Narratives in Action: A Strategy for Research and Analysis.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Yan, Hairong

2003 Neoliberal Governmentality and Neohumanism: Organizing Suzhi/Value Flows Through Labor Recruitment Networks. Cultural Anthropology 18(4): 493-523. Doi: 10.1525/can.2003.18.4.493

2008 New Masters, New Servants: Migration, Development and Women Workers in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Yuan, Elaine J., Miao Feng and James A. Danowski

2013 “Privacy” in Semantic Networks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The Case of Sina Weibo.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3: 1011-10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